

文藝論叢

楊之華著

太平書局

楊之華著

文藝論叢

太平書局

文藝論叢

翻不所版

印准有權

編著者 楊之華

發行人 陶亢德

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四二號
太平書局

電話 九四九一五

印刷所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
太平出版印刷公司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初版

每册定價一百元

自序

寫作之於我，正如我的讀書一樣：總是雜亂無章，興到的時後，便會自然而然的拿起筆來，點上墨水，就在原稿紙上飛舞，寫了又塗，塗了又寫，以至終篇。終篇時的愉快，有如與久別的戀人重會時一樣。

可是，這些愉快的日子是過去了。

自從爲了衣食而投身到新聞界以後，像以前那樣爲自己而寫作的日子便沒有了，然而這枝筆仍丟不開，非但丟不開，而且加重了它的負擔。

因爲職務上的關係，這四五年來，教我認識了好幾十位文化出版界的朋友；自然，俗語所謂「三句不離本行」，每次見面都是拉稿，這是不能幸免的。於是你拉我拉，禮上往還，結果自己也混到被拉之列。

但是，今日的時代其幻變是這麼急速，而生活又是這麼動蕩。最近四五年

來，爲了衣食而走上這條生活的火線上，天天都是掙扎，幾乎連給我一點喘息的時間都沒有，那能再有和以往那樣安定和舒適的時間來給我爲自己而創作呢？但是，朋友的好意又不能不寫，結果我只能從自己個人淺薄的知識範圍以內而著述了，更以這四五年來，我大部份的時間都投到新文學史料方面的收集和整理上去，因此我所能寫得出來的，多數也只限於這一類的東西。

如今收在這個集子裏邊的文章，都是最近四五年來，爲了各方友好的囑託，陸陸續續寫下來的，而且都已發表過的。其中發表在「東方文化」上的兩篇，發表在「中華月報」上的三篇，發表在「風雨談」上的兩篇，發表在「中央導報」上的一篇，發表在「衆論」上的兩篇，發表在「中國與東亞」上的一篇，發表在「遠東月報」上的一篇，發表在「中華副刊」上的三篇，合共十五篇，約有十萬餘字。

本來這些東西，我並不打算這麼快就把它編起集子來賣錢的。可是，這幾年來，委實很窮，尤其是現在；因此就於工餘的時間來整理舊稿，剪剪貼貼。

去年仲夏，曾爲中華日報的「副刊叢書」編了一冊『文壇史料』；現在則爲自己來編輯這冊論文集。

前幾天，多承兩生兄的好意，特爲我此書而代往太平書局接洽。今天早上，更勞他駕，親自到舍下賜覆，說：『太平書局已經答應了，而且可以先付錢，只要書編好送去，即可兌現。』他臨走之前，便和我約定，準於後天下午來和我一同送去，并屬我趕寫序文。

關於這本書的編輯，易士兄早就催促過我的，因爲他也有一本詩集『出發』將要拿到太平書局出版，而且前些時將其全書的原稿交我先看，因此便引起我趕編這本書的勇氣，而以兩週的時間，把以前剪貼好了文章，校閱，補訂，直至昨夜才算草草完成。

本書的出版，多承兩生兄的介紹；本書的編輯，多承易士兄的催促——這在我個人，對於他們的厚意，都是使我十分感謝的。無以爲報，謹在本集之首，敬致我對他們的謝忱。

序。

至於本書編輯的體例，另於「編校後記」中詳之，這裏不再說了。是爲

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二日，楊之華序於上海靜安別墅寓樓。

目次

自序.....(一)

新文藝思潮的起源及其流變.....(一)

中國現代的小說及其流變.....(一七)

中國現代散文的派別及其流變.....(四一)

中國現代新詩的起源及其派別與流變.....(六五)

清代的樸學及其派別與流變.....(八五)

清末的翻譯界.....(九九)

日本現代文學的流派及其變遷·····	(一〇五)
日本文藝家協會史略·····	(一二三)
日本文學報國會·····	(一三七)
日本現代的文學社團·····	(一四七)
日本文學出版界概況·····	(一五三)
日本文學賞·····	(一六七)
新感覺主義的文學論·····	(一七三)
穆時英論·····	(一八一)
林房雄論·····	(一九五)
編校後記·····	(二〇三)

新文藝思潮的起源及其流變

中國近代文藝思潮的勃興，乃始自清末西洋學術（包括科學，哲學及文學）的輸入；由於西洋學術思想的先導以及當時的社會環境的激發，遂產生了中國自有史以來的五四文化大運動。遠在清末的時候，由於林琴南，嚴復等人的從事翻譯（但嚴格地說來，還未能稱之爲翻譯，僅可說是「紹介」而已），西洋的學術，便得源源流入當時中國的文化界；更因康（有爲）梁（啟超）的倡言「維新」，從事政治的改革運動，「時務報」，「新民叢報」，「清議報」，「新小說」等相繼出版，遂造成當時中國學術界的新氣象。（按：梁氏的創辦以上報章，其主要的動機雖是爲了從事政治的改革，但同時他也注意到思想和文學這方面來）及至「民報」創刊而後，中國的民治思想，已在當時的學術界奠下不動的石基。後來「五四運動」中的「文學革命」的成功，乃淵源於此。

說到中國近代文藝的革新，是始於一九一五年陳仲甫（獨秀）所主編的「青年雜誌」，

（按：該刊創刊於是年九月十五日，二卷起改名「新青年」，後并設立「新青年社」。）而全盛於一九一九年（即民八的「五四運動」中的「文學革命」運動的成功）作爲那一運動的主要幹部，除了陳仲甫，胡適二氏之外，尚有李守常（大鈞），魯迅（周樹人），錢玄同（疑古），劉復（半農），周作人（仲密），沈尹默等。隨着「文學革命」這一高潮的成長，「新青年」更擴大了在中國近代文壇上活動的範圍：一九一八年末，陳仲甫兼辦「每週評論」，對當時的國際，政治，社會大加批判；次年（一九一九）一月二十日，更由陳仲甫的支持，傅斯年與羅家倫等結集北大的同學，發刊「新潮雜誌」，從事中國新文學運動；繼則田漢（壽昌）黃仲蘇等所主持的「少年中國」，亦於同年（一九一九）創刊。當時「文學革命」的高潮，幾乎澎湃全國，而上海與北京兩地便成爲這一運動的主潮之領導及發源的重心。

一九二〇年，「新潮社」一方面因周作人等相繼加入，而另一方面又以羅家倫，傅斯年，張申甫，徐子俊等主要幹部的相繼去國，遂形成了「新潮社」的改組，截至是年十月二十八日止，從各地社員寄回的選舉結果：周作人當選爲「新潮社」的主任編輯，孟壽椿當選爲主任幹事；孫伏園，顧頡剛，陳達材，毛準四人爲編輯，郭紹虞，孫伏園（兼任）王星漢，李榮第，高尚德爲幹事。直至三卷二期爲止。隨着「新潮社」的消沉，「文學研究會」遂乘

時而起（一九二二年一月十日）其中的幹部作家，除了周作人，孫伏園，郭紹虞三人是前「新潮社」的主幹之外，復有沈雁冰，鄭振鐸，葉紹鈞，許地山，王統照，耿濟之，朱希祖，蔣百里，瞿世英九人參加，由周作人起草簡章，發表宣言，一面由沈雁冰接編商務書館所出版的「小說月報」（自十二卷一期起）從事西洋文學的介紹及新文學之創作；而另一面則編印叢書，大量開發中國近代的文學出版物。繼之，則又有「文學旬刊」（自八十一期起改為週刊）及「兒童世界」等刊的發動。一時「文學研究會」的聲名，幾乎譽滿中國當時的整個學術界。

及至一九二二年，郭沫若，郁達夫，成仿吾，張資平等，先後學成歸國，眼見「文學研究會」同人的名聲與日俱增，殊為不甘，便集合了幾個日本的留學生，組織「創造社」，出版「創造季刊」（一九二二年八月創刊）揭起「為藝術而藝術」的大旗，顯明地與「為人生而藝術」的「文學研究會」對立，一時因文藝見解的不同而引起論戰，風起雲湧，其中以郭沫若及成仿吾的評論為毒辣，演至最後，竟連退居北平「晨報副刊」的魯迅，也被列入「創造社」抨擊的對象了。一九二三年，「創造社」以其突起之餘威，更進一步，繼「季刊」之後，又有「創造週報」及「創造日」的發行；他們除了從事於「浪漫派」的詩與小說的創作

之外，兼從事於西洋文學的介紹。（如尼采的「詩說」，但丁的「神曲」，歌德的小說，雪萊及拜倫的詩歌等的翻譯）直至一九二四年以社費關係，無法維持，遂告停刊，然而郭成等人，雄心未死，再度邀集青年文士，發刊「洪水」（一九二五創刊，共三卷三十六期），後來作為「太陽社」的主幹的蔣光赤，楊邨人，錢杏邨等，即為當時「洪水」的幹部；而後來日漸成名的周全平，倪貽德，葉靈鳳，鄭伯奇，穆木天等，亦為「創造社」演進至「洪水」時代的主要作家。

作為「新青年」的幹部作家而執教於北大的魯迅，因痛感於段內閣的非法取締言論，而糾集同人，發刊「語絲」，其時（一九二四年）恰巧孫伏園退出北平「晨報」，遂邀其加入，此外如周作人，錢玄同，劉半農等「新青年」時代的「同人」，及新起之秀林玉堂（即語堂），俞平伯，顧頤剛，章依萍，川島（即章予塵）等，亦為「語絲」的基本撰述作家。以其文字的潑辣，以及見解的高遠，時人稱其作者為「語絲派」。其後，魯迅復繼「語絲社」而組「未名社」，一面從事於新文學的創作，而另一面則又從事於弱小民族的文學及新俄文學的翻譯與介紹。如曹靖華，韋素園，李霽野，章叢蕪，臺靜儼等，均為「未名社」的幹部作家。其後，魯迅更繼「語絲」及「未名」兩社之後而再三組織「莽原」及「奔流」，對於

中國的文藝翻譯界，特別是關於俄國（如果戈里，高爾基，妥斯退以夫斯基等人的作品）的文學及其理論，有着很大的貢獻；而後來另立「狂飈社」鼓吹「中國的狂飈運動」的高長虹，以及後來參加左翼文學活動的柔石，白莽，殷夫等，都是當時「奔流」及「莽原」的幹部。因此魯迅的起來，一方面固然發動了第一個十年（一九一五——一九二五）的文學運動，而別一方面，他也支配着第二個十年（一九二五——一九三五）的中國新文壇，直至病逝（一九三六，十月）於上海的時候。

與「語絲派」同時突起於北平的「現代評論社」，其主要的幹部正是在當時抨擊魯迅最烈的陳源（又名西滢），而凌叔華，陳衡哲，丁西林，楊振聲以及「新月派」的領袖徐志摩等，都是「現代評論」的幹部作家。及至章士釗投入段內閣幕下為教育總長之後，「甲寅什誌」即應運而生，配合了陳源主持的「現代評論」，共同揭起「反語絲派」的大旗，初以文字辯駁，繼則施行政治壓迫，下令通緝；魯迅等，相偕「北大」同人潛逃南下，張作霖進軍北京，形勢更為嚴重，李守常不幸遭難而死。由於北洋軍閥的勢力日漸擴大，波及上海，於是郭沫若，郁達夫，成仿吾等，也相偕南逃，而參加了實際的國民革命運動。一時廣州的文壇，活躍萬分，各種報章什誌，都一同鼓吹北伐。而郭沫若，成仿吾等，更進一步，隨同國

民革命軍的北伐而進抵武漢；至於尙留在廣州的郁達夫，則承繼着以前爲文化而工作的使命，於廣州城中的昌興街「丁卜書店」樓上設立「創造社廣州分社」來。從事「創造月報」的發刊，并常常來往於滬粵之途上。

以「五卅運動」爲契機，由於「創造社」的「革命文學」口號的提出，遂有「普羅文學」的萌芽。加以北伐告成，中國國民黨舉行清黨運動，左傾份子，紛紛離黨亡命，潛入上海兩租界，而從事「普羅文學」運動。「革命文學」的提出，實乃成仿吾揭竿於前，郭沫若指揮於後；繼則以蔣光赤的「十月革命與俄羅斯文學」一文（刊於「創造月報」一卷二期）而開中國「普羅文學」的啟蒙運動之先河。未久，郭沫若得內山九造的援助，逃亡日本，一去十年，「創造社」遂無形解散。其時正藉「太陽社」的「普羅文學」口號高唱入雲之際，由粵返滬的魯迅也不甘於寂寞，遂與「創造社」的主幹之一的郁達夫合編「萌芽」月刊，繼續其十年以來的文藝工作。當時魯迅有見於「普羅文學」在初期理論上的幼稚與淺薄，頗爲恥笑，因而引起「太陽社」同人的大施攻擊。而成仿吾以郭沫若的再度去國，頗感到實力上的單薄，於是一面結合「創造社」舊同人（如郁達夫，王獨清，張資平等），另一面兼攬新進的青年作家李初梨，馮乃超等，編印「文化批判」，「文藝生活」，「樂羣月刊」等。繼則

劉呐鷗，戴望舒等開設「水沫書店」（一九二八），延攬名家，而從事世界各國文學理論及創作的介紹：如魯迅的介紹新俄文藝理論（如「文藝政策」等書），陳望道的翻譯各種社會科學與藝術的理論（如「藝術的社會生活」等），戴望舒的譯述俄國「象徵派」的理論，劉呐鷗的介紹日本「新感覺派」的小說（如橫光利一，片岡鐵兵，池谷信三郎，林房雄諸氏的小說）等，對於當時的文化界，都有着莫大的幫助。

一方面由於「太陽社」及後期「創造社」諸幹部作家的源源輸入蘇聯十月革命前後的文學理論及創作，因而便影響到當時各新進作家的改變思想，而迎合時代的新潮；另一方面由於魯迅的沉默與冷靜的研究新俄文藝思潮，使其在文學上的思想與見解日漸轉變，而其對「普羅文學」的態度，已由在原則上并不反對進入到共鳴的階段了。同時魯迅更目覩着日本文藝界的蓬勃進展（當時林房雄，藏原唯人，中野重治，山田清三郎等也曾組織過「日本無產者藝術家協會」而演進為「日本普羅文化大聯盟」，并作着震驚世界的發展）爲了推進中國的文藝界，惟有聯合各同人，發動新的文藝運動，以期進入世界文藝界。結果，中國的「普羅文學」運動終於一九三〇年結成了「左翼作家大聯盟」，出席簽名參加這一聯盟的作家，計有六十餘位，幾將在當時反政府的作家全部網羅。其在當時所出版的機關刊物，計有「十

字街頭」（魯迅主編）、「文學月報」（周起應主編），「文藝新地」（柔石主編）、「北斗」月刊（丁玲主編）等。而其幹部作家胡也頻，柔石，白莽，殷夫，馮鑑，錢杏邨，楊邨人，蔣光赤，李偉森等，都參加了實際的工作，祕密地從事於國際間的政治活動。次年（一九三一）「左聯」的祕密工作已爲當時的政府查悉，一面下令緝捕，一面查禁「左聯」的出版物。結果胡也頻，白莽，柔石，殷夫，李偉森等十二人，同時於上海租界內捕獲，移交中國政府執行槍決；而「文學月報」「北斗」等「左聯」的機關雜誌亦已禁止出版。一時「左聯」受到這次政府上的突擊，人心惶惶，內部大起變化，右傾的右傾，逃亡的逃亡，退出的退出，悔過的悔過，但其中仍有堅持到底的幹部，於這次大動亂之後，即行澄清「動搖份子」，再度改組刷新，唯是終因幹部的缺少，力量的薄弱，而轉入政治的暗流，同時「普羅文學」的主潮也因這次的大變動而無形消沉了。

自從「普羅文學」這一主潮下降以後，一九三一後半年至一九三二前半年的這時間，中國的文壇宛如死水，幾乎靜止到一無波瀾。但由於靜極而動的原理，作爲中國新興的都會派的文學——「現代社」終於一九三二年五月以其簇新的姿態出現於中國的文藝界了，作爲這一文學社團的幹部人物，計有施蛰存，戴望舒，穆時英，杜衡，劉呐鷗，葉靈鳳等，幾乎連會